



杜威论

杜祖贻 著

教育与民主主义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杜威论教育与民主主义/杜祖贻著.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ISBN 7-107-16683-2

I. 杜...

II. 杜...

III. 杜威, J. (1859~1952) —民主主义教育

IV. G4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 037384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邮编: 100009)

网址: <http://www.pep.com.cn>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 240 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0 001~1 600 册

定价: 13.80 元

序

杜祖贻教授的学术专著《杜威论教育与民主主义》中文版即将与读者见面。这本难得的佳作，将备受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深入研究，亦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应邀在中国各地进行访问考察和教育讲演。通过一系列活动，杜威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了解，而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人士，则进一步了解了杜威的思想和美国的文化教育。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中美文化交流。杜威的教育思想对旧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深入探讨杜威与中国文化教育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在杜威来华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在杜威来华的前几年，新文化运动即已兴起。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结合，掀起了一股复古尊孔的逆流。袁世凯政府祭天祀孔，把读经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程。面对这股复古思潮，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坚持民主主义的理想，发动了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了“人权”（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战。他在文中还要求青年建立新的人生观，并向广大青年提出六项希望：“自主的

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是新文化运动中第一篇纲领性的文章。1916年，《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并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蔡元培、胡适等先后参加编辑或撰稿工作，使《新青年》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进步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学校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他积极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力倡导进步的思想文化。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聚集北京大学，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重要阵地。

提倡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所谓民主，就是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专制和独裁，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所谓科学，就是指自然科学和科学观点，提倡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在《新青年》杂志上，经常刊登一些宣传科学知识、破除神鬼迷信的文章；介绍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陈独秀坚决提倡民主和科学——“德赛两先生”。由于提倡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斗争锋芒很快就指向以维护封建专制为基本内容的孔子学说，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在政治上，对封建独裁政权，对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对鼓吹复古主义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进行了空前的沉重打击，它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加速了人们的觉醒，尤其是促使青年知识分子去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杜威来华初期，正值中国人民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新文化

运动。在此期间,《新青年》杂志继续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介绍西方的民主政治、科学思想和文化教育,探索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扩大了中西文化、教育、学术的交流。杜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中应邀来华访问、讲学的。

由此可见,当时一批有识之士邀请杜威来华访问、讲学,是为了发展中国文化教育的需要;杜威能够欣然接受这次邀请,也不是偶然的。他期望对历史悠久的中国能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对中国发生的新变化怀有很大的兴趣。其结果,杜威的中国之行,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教育、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对杜威本人的社会、政治观点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二

1919年4月30日,杜威应中国五所学术机构的联合邀请,由日本乘船抵达上海,开始了在中国的访问和讲学活动。过了三天,五四运动爆发了。杜威目睹了广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军阀政府,也目睹了社会各界人士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他十分震惊,不禁感慨地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从某些方面说来,他们比我们有更多的民主。……当舆论像这样真正表达出来时,它却有着显著的影响。”^①他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事情非常关注。当中国学生希望他能在中国多待一些日子时,他很乐意,并向哥伦比亚大学请假一年,后来又续假一年,直到1921年7月11日。这样,杜威在中国待了两年零两个月之久。

在中国期间,杜威曾访问考察过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

^① 郭小平:《杜威》,开明出版社、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第128~129页。

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北、湖南等 11 个省和北京、上海两市。杜威还应聘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在他的学生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的安排下，杜威还到各地去讲演，其中比较系统的是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五大讲演》和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作的讲演。

杜威在北京及中国各地的讲演内容十分广泛。例如，关于社会与政治哲学方面的讲演 16 次，关于教育哲学方面的讲演 16 次，关于伦理学方面的讲演 15 次，关于现代三大哲学家（詹姆士、柏格森、罗素）的讲演三次。还有关于现代教育趋势的讲演，关于美国民主发展的讲演，关于实验逻辑的系列讲演，等等。另有一些专题报告。这些讲演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胡适曾多次担任翻译。杜威的讲演内容，都及时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刊登出来，广大知识分子竞相传阅。杜威在华期间，他的《五大讲演》已经印了 10 次，每次印数一万册。由此可见，杜威的讲演在当时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杜威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十分关心。他在历次讲演中提出了许多意见，与中国学者一起探索中国发展教育的正确道路。现将其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第一，发展教育，要有信心。杜威说：“贵国人士，对于教育前途不可失望。或见西方各国如此富强，以为其教育制度必早已完美，教育事业必已有很久的历史，深恐一时不易追随，不知欧美普及教育之发达，距今亦不过近百年内的事。就以吾美国而论，实施普及教育，也不过是七十年前的事。……无论何种事业，如商业、政治，均不能与教育分离，无教育则无各种事业。故吾美国的各种事业，均不能离开教育而独立。但是吾美国兴办教育为时仅七十年，非甚悠久。故很希望诸君切不要以为教育不易收速效，而产生失望之心。何况贵国师道尊严，社会对于教育界人士颇有信仰，此实可助教育的发展。”他又说：“欧美兴办教育，时间虽然不久，但也有了七十年。这七十年中，欧美各国所经历的失败，贵国可以不

重蹈覆辙；所获得的成效，贵国可作为准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收效更易。如果贵国教育界能利用他人的经验，作为自己的经验，则事半功倍，同欧美并驾齐驱，是很容易办到的，就是胜过欧美，亦非难事。”^① 杜威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要我们在发展教育的过程中，既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和短处，也要看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增强信心，不断进取，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学习外国的经验，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需要。杜威说：“吾人试观中国的教育，实根源于日本，是直接模仿日本的教育，间接模仿德国的教育，而不懂得要确定一国教育的宗旨和制度，必须根据国家的情况，考察国民的需要，而精心定之。决不可不根据国情，不考察需要，而胡乱地仿效他国，这是没有不失败的。这一点是中国一般教育应该注意的。”他还进一步地说：“一国的教育决不可胡乱摹仿别国。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摹仿都只能学到别国的表面种种形式编制，决不能得到内部的特殊精神。况且现在各国都在逐渐改良教育，等到你们完全摹仿成功时，他们早已暗中把旧制度逐渐变换过了。你们还是落后赶不上。所以我希望中国的教育家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学说作为一种参考材料，如此做去，方才可以造成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② 杜威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情况相当了解，他有意识地针对当时中国教育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他一再强调发展教育不能盲目地模仿外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社会需要，参考外国的经验和理论来建立中国现代的新教育。这些意见是相当中肯的。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也证明杜威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① ^② 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437~438、438~439、443页。

第三，要教育学生发扬爱国精神。杜威说：“学生以学为目的，在于能以聪慧的爱国精神输入于政治。所研究追求的，都必须是为了增进国家秩序的稳定。务必做一分事，对国家就有一分利益。决不可感情用事，需有目的、有方法、有决心，志之所在，往而必达。否则五分钟的热血，固然能痛快一时，但如火药爆发，转瞬即灭，又如水汽蒸发，立即消散。但若加以智慧，则火药可以制成枪弹，水汽可以转动机械。其利益是无限的。更进一步讲，我们学界中的人，可以发扬自己的智慧，将社会各方面组成得像机械那样，一轮一钉互相组合，就能发挥极大的作用，如果拆散开来，齿轮螺钉，互不相关，那就成了废物。所以必须有正当团体，互相帮助，才可达到最好的目的。”他还举例说：“日前在上海登岸的时候，正当中日青岛问题发生，见一般国民面有愁色，都说是由于政府不好，内阁腐败所造成的。这足见中国国民对于国家能有负责之心。在这个时候，中国气氛表现很悲观，大学学生为国家尽力，不顾利害，勃然发动，组织极大的团体，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旅华外人见此举动，深表同情。这是共和国国民所应有的举动。因为共和国的兴亡，责任全在国民。所以世界上无论共和专制，建设各种事业，全赖人民自己去办。这对于共和国尤为重要。……但欲有此共和的精神，必须有完善的教育，始可养成此真正共和的精神。”^①杜威的意见是正确的。一个国家的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其爱国精神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要通过完善的教育，启发其智慧并加以组合，从而使其担负起振兴国家的重任。

第四，要教育学生情智互用。杜威说：“五四运动以来，我想学生比前应当更热心求学。他们因外交问题，激动爱国心，所以有新动机、新兴趣，对于学问自然更亲切有味了。爱国的动机又大，欲救同胞之心又切，对于进德修业自然欲罢不能了。总而言之，理

^① 《杜威教育论著选》，第440~441页。

智和情感不是相反，而是相成。情绪能帮助理智，鼓助理智，不至流于空虚或知行不一；理智能启导情绪，坚固情绪，不至流于盲目妄动或虎头蛇尾。……说到爱国，也要情智互用才好。救国救民，谈何容易，方法万千，各需专门知识，能够单依感情做事吗？要是单有感情而无知识，想讲卫生而不知怎样防止疾疫，想做买卖而不懂怎样经营店务，还有成功的希望吗？所以感情必须受理智的启导。若说感情在理智之先，未尝不对，因为感情是行为的原动力，但是一到实行，知识就更重要了。……所以使感情坚定，要有知识，问题看清楚了，然后能始终如一。”^① 杜威以生动的比喻，阐述情智相辅相成的道理，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第五，中国应当努力创造，对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杜威说：“现在的世界是算总账的时候，中国这个古国不应单纯去模仿，应当自己创造。物质方面，西洋已占先了一百年，中国自然稍微吃亏。但是社会方面，西洋也还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东西两洋都有新的需要。中国本来很注重社会方面，如人生问题、伦理问题等。所以希望中国既与西方同处一个新境遇中，应当努力创造有贡献于世界的文明。吾自到东方以来，觉得东方对于新科学虽差，经验却很丰富。几千年的经验背着走不动固然不好，然而经验也有许多好处：含有许多人本观念，也可用新的方法来整理一下，应用到社会科学方面去。西洋文明的大缺点是物质科学进步太速，而社会科学、人生科学不能同时并进。例如造一机器可以破坏无数的产业，而其他方面没有保障，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应当研究怎么会使得社会科学与物质方面有点欠缺的问题，然而现在对于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正与西洋一般，它有几千年人生科学的经验，可见社会方面是向来注重的。我希望中国不单去输入模仿，要去创造，对于文化的危险有所补救，对于西洋社会的缺点有所补益，对

^① 《杜威教育论著选》，第452~453页。

于世界的文化有所贡献。”^① 杜威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东方和西方在社会科学与物质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其长短，分析其原因，并对中国文化教育界寄予厚望。可谓远见卓识，语重心长。

杜威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对传统教育理论进行了批判，对教育史上的许多理论进行了探讨。他注重教育实践，对现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他是现代西方教育史上颇有影响的教育家。他对美国的教育及许多国家的教育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体系，对旧中国教育方面的影响要比哲学方面大得多。杜威来华后，旧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方法和内容均仿照美国的教育。例如，1922年公布施行的“新学制”中，提出七项标准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在总说明中提出，学制系统大致以儿童身心发达时期为根据，分为三段。教育以儿童为中心，学制系统宜顾及其个性及智能，故高等中等教育之编课，采用选科制，初等教育之升级采用弹性制等。这个学制是采用美国的学制。在教学方法上，提倡“从做中学”、“兴趣与训练的调和”，等等。显然，“新学制”是以杜威的教育思想为楷模的。

在中国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如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等都是杜威的学生。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教育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有的甚至以杜威思想为指导。杜威思想在旧中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影响相当深广，这与杜威中国之行有很大关系。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②

① 《杜威教育论著选》，第444~445页。

② 《胡适文选》，亚东图书馆1920年，第13页。

杜威在中国考察和讲学期间，所到之处，受到了广大师生、知识界、舆论界和当局的热烈欢迎和精心安排。杜威一行感到十分愉快。尤其是杜威本人，他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和爱国精神，更是念念不忘。随同杜威一起访华的杜威的女儿露西·杜威（Lucy Dewey）在访华46年后说：在中国访问的“那两年是我一生中最丰富多彩和最令人愉快的，对我的父母来说也同样如此”^①。杜威的另一个女儿简·杜威（Jane Dewey）在她写的《杜威传》中说：“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②

杜威的思想曾经影响过中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人士，而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深深地影响了杜威。这说明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彼此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三

杜威曾到过日本、中国、苏联、墨西哥、土耳其等许多国家进行访问和讲学并撰写了许多著作。据统计，共有专著44种，论文815篇，传播于几十个国家。杜威教育思想是当时进步教育运动的产物，是对传统教育思想的一种批判，它对当时美国新教育体制的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世界许多国家的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杜威关于教育理论的著作很多，其中《民主主义与教育》

^① G·戴克威曾：《杜威的生平与精神》，1978年英文版，第200页。

^② 简·杜威著，单中惠编译：《杜威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2页。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一书，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代表作。该书于 1916 年出版，有二十多种译本。杜威在书中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他在芝加哥实验学校实验以及当时教育改革理论研讨中基本形成的教育思想。这部书被誉为教育的经典著作、进步教育理论的总纲。全书共 26 章。前 7 章论教育的意义、作用和教育如何适应民主主义社会美国的需要，提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观点；后 16 章根据上述观点分别论述教育的目的、兴趣和训练、经验和思想、教学法和教材的性质、课程、教育和职业等问题；最后 3 章归结到实用主义的哲学基础，内容比较广泛。

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杜威的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对民主主义与教育这个主题，在更深层次上进行探讨。他对民主主义与教育的概念及其内容，有了更清晰的描述和更全面的概括；对民主主义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阐述。总之，杜威后来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杜祖贻教授在全面考察有关文献资料之后敏锐地发现，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学者对杜威关于教育与民主主义理想的关系，进行过专题研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能为教育增添新的知识，并将对约翰·杜威的哲学贡献一些新的睿识和理解”。他又说：“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和通晓杜威的思想；同时，为研究民主主义和教育的哲学思想作一点贡献。”可见著者的研究目的和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其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为了撰写《杜威论教育与民主主义》这本学术著作，杜祖贻教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孜孜不倦，苦心孤诣，从浩瀚的文献中，锐意穷搜，撷取精华；高屋建瓴，一气呵成。这本专著资料翔实，论证严密，结构严谨，脉络分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全书共分 6 章 14 节。著者在第一章“导言”中，明确指出本项研究的问题、意义、方法和提纲。开宗明义，使人一目了然。在

第二章中，著者对杜威关于“民主主义理想的概念”、“教育过程的概念”及“人性的概念”，作了深入的探讨和剖析。旁征博引，令人耳目一新。在第三章中，着重介绍杜威哲学中的理智方法。著者分别对“作为探究方法的理智”、“作为民主主义方法的理智”及“作为教育方法的理智”，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分析，丝丝入扣，给人以新的启迪。在第四章中，系统介绍杜威关于“作为民主主义共同体的学校”的一些论述。著者着重对“教室里的民主”和“教育管理中的民主”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归纳和分析，说理透辟，给人以全新的认识。在第五章中，讨论“学校与大社会”的关系。著者分别介绍杜威关于“学校与公众”、“学校和一体化的社会”的主要论点并指明其发展趋势。见解精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第六章是“结论”。著者独具只眼，对杜威关于民主主义与教育的理论，作了高度的概括；对其主要观点和论据，作了精辟的阐述；对其学术价值，作了充分的肯定。层次清楚，重点突出，使人们对杜威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对其民主主义与教育的精辟见解，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杜祖贻教授是海内外著名学者。他长期在国内外多所高等学府，如美国密歇根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从事教学、行政和科学研究工作，成绩斐然，遐迩闻名。他对西方哲学和教育学有很深的造诣；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典籍有深厚的功底。他学贯中西，硕果累累。他勤奋向学，治学严谨，曾多次造访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语言学家王力、物理学家吴大猷、东方学家季羨林、哲学家张岱年等当代名流大师，向他们质疑问难。这种精神令人钦佩。

杜教授的《杜威论教育与民主主义》一书，首次对杜威关于民主主义与教育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客观、深入的评析；是他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结晶；是他对教育界和学术界作出的新贡献。这本著作的出版发行，将有助于开阔人们的眼界，提高

人们对杜威哲学的认识，促进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及其影响的研究。

曲士培

2001年5月于北京大学

曲士培 安徽和县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高等教育史。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著作十余本。代表性专著《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荣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目录

序	1
第一章 导言	1
1. 本项研究之问题	1
2. 本项研究之意义	4
3. 本项研究之方法	5
4. 研究之提纲	6
第二章 民主主义、教育及人性	8
1. 杜威关于民主主义理想的概念	8
2. 杜威关于教育过程的概念	12
3. 杜威关于人性的概念	16
第三章 杜威哲学中的理智方法	23
1. 作为探究方法的理智	25
2. 作为民主主义方法的理智	33
3. 作为教育方法的理智	42
第四章 作为民主主义共同体的学校	51
1. 教室里的民主	52
2. 教育管理中的民主	62
第五章 学校与大社会	72
1. 学校与公众	73

2. 学校和一体化的社会	80
第六章 结论	90
参考文献	102
附录	105
1. 杜威早期著作目录 (1882~1898)	105
2. 杜威中期著作目录 (1899~1924)	114
3. 杜威晚期著作目录 (1925~1953)	140
后记	181

第一章 导言

■ 1. 本项研究之问题

剖析约翰·杜威有关教育与民主主义理想之间关系的思想的形成，乃是此项研究之目的。杜威撰写了很多论述民主主义的书，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正面论及“民主主义理想”的问题。^①然而，当读者仔细研究这一片段时就会发现它只是一个提纲，只是对他的丰富深刻的民主主义思想作了概括性的勾勒。因此，读者必须从杜威的其他一些著作中去寻找有关民主主义理想的全面表述。此外，杜威还撰写了许多关于教育过程本质的专著和文章。在这些著作中，有的与杜威的民主观紧密相联，有的却无直接关系。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要在杜威的关于民主主义和关于教育问题的论述中，揭示出那些明白无误的观点，探明那含蓄隐晦的思想，从而把民主主义和教育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讨论。这样，我们就能更清楚精确地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重要性。

在杜威一生的哲学研究中，他对民主与教育的关系始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早在1897年，即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出版前的二十年，杜威发表了一本题为《我的教育信条》的专著。^②在这本著作里，杜威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杜威认为，学校

^①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16年，第100~102页。

^② 杜威：《我的教育信条》，纽约：E. L. 凯洛格出版公司，1987年。